

西方政治思想史论集

吴 恩 裕

天津人民出版社

西方政治思想史论集

吴恩裕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唐山市人民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6 1/4 字数134,000

一九八一年八月第一版

一九八一年八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200

统一书号:3072·553

定 价: 0.80元

前 言

我本是学哲学的，后来又研究了西方政治思想史。1939年回国后直到1966年，虽偶有间断，在大学里却是一直在教这门课或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解放前除了编讲义之外，我写过《西洋上古中世政治思想史》、《政治学问题研究》和《政治思想与逻辑》等书。这些书基本上都是在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下写的。虽然其中有些资料甚至某些论据或有可取，但都是属于被扬弃的东西了。我在伦敦写的论文《马克思的政治思想》一书（有中译本，1945年商务印书馆版），是在黑暗中的摸索。但其中驳罗素(B. Russell)的历史发展“智慧动力论”、驳他对于科学发明与生产力的关系的歪曲、驳胡克(S. Hook)把实在(reality)和真理(truth)混淆起来的论据，以及我对马克思批判边沁(Bentham)和康德(Kant)的阐释等等，也还无回顾一下的价值。我在北京大学一直教西方政治思想史这门课，1952年院系调整到北京政法学院后又教过两次课。从那时以后，我就不再教这门课的机会了。

但是我并没有停止这方面的思考和探索，也没有完全停止这方面的工作。尽管1954年起，我开始了搜集和研究有关《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生平的材料。二十多年来，我写出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讲义约二十万言；写出西方当代法学评介的东西约五万言；西方政治理论名著中译本的序言约五万言；古希腊政治

思想史五万言；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约三万言；其他有关政治学和法学的论文七、八万言；1962年由我主编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西方历代政治论著选读》的总序和说明共七万言。本书所编列的这几篇东西，仅仅是上述各项工作中我认为可能对读者有些帮助的一部分，都是很不成熟的，希望读者指正。本书名为《西方政治思想史论集》，是因为其中的文章是单篇的“史论”，而不是按时代和人头原原本本连续介绍和论述的“思想史”。

近二十多年来，除了长期的颠连动荡之外，我搞《红楼梦》的时间多一些，搞这方面的东西用的时间很少。但我对西方政治思想史方面的原著读过不少，也费了许多功夫去考虑如何重建这门学科的问题。写东西，特别是写历史，总是有、而且不可避免地会有观点的问题。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站在他们的阶级立场，用他们的阶级观点和方法来搜集材料、选择问题，写他们的政治思想史。修正主义学者也用被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来处理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问题。据我们前些年看到的苏联学者写的政治学说史著作，已经可以看出他们在许多重要问题上还没有摆脱资产阶级的某些观点和方法。社会科学是阶级斗争的科学，我们不能把资产阶级的和修正主义的政治思想史拿来就用，我们必须有我们自己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出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但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这样的西方政治思想史。这就说明：我们需要重建西方政治思想史这门科学。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另文说明我的看法，提出我的具体计划。今后我所希望的，是能在一个通过集体讨论而拟定的总提纲的指导下，分工合作，集体写成一部西方政治思想史。这个愿望，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会得到实现。

尽管我自己原来想写一部中型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愿望，由于岁月蹉跎、年龄已大、精力不及，是做不到了；但若能用集体的力量来写成一部比较大型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并能把社会发展的历史背景及其与哲学史的关系讲清楚，也将是我引以为快的事。

吴 恩 裕

1978年9月6日

附 记

整理完作者的这部书稿，重读他的这篇《前言》后，有几句话想要说一说。这篇简短的《前言》是作者就其一生治学的经历、精神和心情向读者所作的诚实的自白。可以看得出来，他毕生下功夫最深的是西方政治思想史；这是他真正的“正业”，而搜集、研究曹雪芹的生平材料，不过是他长期没有条件“务正业”的情况下逼出来的“副业”。然而，孜孜数十年的辛勤耕耘，最后却不容把成熟的粮食收割下来奉献于大家，这又岂止是他个人的悲剧呢？

直到1978年他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继而兼任北京大学教授，在该院该校有关领导同志的鼓励和支持下，他才又获得机会重理旧业。他满心欢悦、极度振奋，迸发着火一般的工作热情：一面进行自己的调查、研究、写作；一面讲课、带研究生；又忙于罗致人才、草拟计划，准备集体讨论编写西方政治思想史；手头还有急待完成的曹雪芹的传记故事等等。纵然他

有老骥伏枥的壮心，但以七十之年，备经摧残的心身，对于猛然压来的千斤重担，毕竟是力不从心，承受不了了。1978年11月，严重的急性心肌梗塞症袭来，经抢救复苏后，他又以顽强的精神，抱病工作了一年。这期间，讲课、开会、写作，还逐字逐句读完了即将出版的两本书的六十万字校样……终于，1979年12月，正伏案写着一篇未完的文稿时，他突然掷笔长逝了。

我相信，直到他死，他头脑里还没有想到死；他还是满怀信心，殷殷寄望于他耗费心血最多、投入感情最深的、可望亲自参与编写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一书的写成。如今，这只能成为生者的惋惜和逝者本人的千古遗憾了。所幸据我所知，作者最后所将“引以为快的事”，他那始终念兹在兹的愿望——一本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编写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在当前春色满园的学术界，“在不远的将来”确实“会实现”的。那么，我又多么希望他有灵知悉这一喜讯而能够心怀快慰于泉下！

至于这本《论集》，我深知他自己并不认为满意，他生前对我谈过多次。但是我想，如果我们看一看他是在什么情况下断断续续写成这些东西的，我们不免会寄予他一些同情和谅解。《论集》中的少数篇章写在1966年之前，大部分则是在1972年从“五七”干校回来之后写的。那时，他已经历了几年“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艰难处境，当了一届一直不予做政治结论、不获解放的、不合格的“五七战士”，而且就在干校期间瞎去一只眼睛。回到家里，人，四散了；书，多年搜集和苦读过的，荡然无存了。凭着仅存的一只近视眼睛看书写字，一时不能适应，只能靠自己口述，别人记录；而手边又缺乏大量必用的资料，这就使他的写作在文字表达和资料引用上

都大大受到局限。因此他感到不满意，也就是《前言》中说的“不成熟”。但是我们知道他一向是个治学严谨的人，他拿出来的这些东西是经过他自己的慎重选择，认为其中的基本观点和据以所作的分析，都是自己的研究和思考的心得，可以提供读者参考的。本来，他还计划着要写但丁、马基雅弗里和霍布斯等几篇专论，可惜都没有来得及写成。

作者已去，我没有权利改动他的原作，却有义务促其早日贡献于读者之前。因此，从内容到文字以至编排格式，都尽量保持原样。我只是作了一点技术上的整理。值作者逝世周年、本书付梓前夕，附记数语以祭。

骆 静 兰

1980年12月

目 录

前 言

第一篇	古希腊政治思想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	(1)
第二篇	古希腊自然哲学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米利都学派的反宗教意义·····	(9)
第三篇	世界观同政治思想的统一或乖离——毕达哥拉斯和赫拉克利特·····	(13)
第四篇	最早的折衷和“希腊的学校”——梭伦和伯里克利·····	(20)
一	梭伦的政治思想·····	(20)
二	伯里克利的政治思想·····	(25)
第五篇	自然对抗习俗——论智者们的政治观点·····	(32)
第六篇	奴隶主民主与反奴隶主民主的思想——苏格拉底和德谟克利特·····	(43)
第七篇	“哲学王”独裁统治思想的代表——柏拉图·····	(54)
第八篇	要用中等阶层执政的民主制求得政治稳定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	(65)
第九篇	城市国家没落的思想——伊壁鸠鲁和斯多葛派·····	(76)
一	伊壁鸠鲁派的政治思想·····	(77)
二	斯多葛派的政治思想·····	(82)

第十篇 神学·政治·社会经济——阿奎那的政治思想

..... (86)

第十一篇 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 (99)

一 十七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99)

二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 (100)

三 革命时期的阶级矛盾在思想战线上的反映..... (103)

四 拥护封建王权的政治思想——费尔麦..... (105)

五 论证绝对主义的政治思想——霍布斯..... (108)

六 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政治思想——密尔顿和哈灵顿..... (114)

七 平等派的政治思想——李尔本..... (119)

八 掘地派的政治思想——温斯坦莱..... (122)

九 一六八八年阶级妥协的政治思想——洛克..... (124)

第十二篇 西方近代法学流派浅论..... (138)

一 自然法学派..... (139)

二 历史法学派..... (146)

三 分析法学派..... (150)

四 社会连带关系说的法学..... (155)

五 美国的社会法学派..... (161)

六 纯粹法学..... (168)

第 一 篇

古希腊政治思想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

讲西欧的政治思想史是从古希腊开始，因为古希腊是西方政治思想的发源地。在讲古希腊的政治思想之前，必须先了解一下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

希腊位于地中海东部的巴尔干半岛南部。气候夏季很长、酷热，冬天没有严寒。全境交错着山岭，肥沃的土地不多，多石的土壤不易生长谷物，故当地居民多种植橄榄和葡萄，山区则只能从事畜牧业。粮食的供应大部分仰给与外国交换。

希腊人原不是希腊的土著，约在公元前二千年左右，他们开始从多瑙河的下游向南移殖，逐渐进入爱琴海区域。那时他们的社会发展还在氏族公社的阶段。公元前十二、三世纪以后，才分支移入希腊半岛。

公元前十世纪左右，他们的氏族公社开始解体，出现了土地公有的村社，居民从事耕作和畜牧，也有了工艺。如石器、木器、陶器等等。他们是物物交换的“奥塔克”（裕按：即“自给自足”）经济。他们使用奴隶劳动，但他们的奴隶最初并不是村社的成员。种植橄榄和葡萄的成本既很高，收成又无保障，一遇荒年则收成尽失，所以许多氏族成员由于负债而丧失了自己的份地——被氏族里的贵族兼并。这样这些原来是自由民的希腊人也就沦为债务奴隶。

从公元前八世纪到六世纪，已经大量使用铁器，奴隶的数量也逐步增多，这就使希腊的农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手工业也开始从农业里分离出来。精美的手工业制品和农业的产品葡萄酒、橄榄油、蜂蜜等等，就成为当时希腊对外贸易的重要项目。

由于氏族贵族在战争中财物的掠夺和私蓄，由于他们广泛使用俘虏来的奴隶和债务奴隶的劳动力，并不断地侵占贫苦氏族成员的土地，所以在私有财产发生的同时，也滋生了阶级的萌芽。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使原始公社的生产关系逐渐不能适应，阶级的矛盾逐渐加深——这就越来越具备了产生国家的社会经济条件。

希腊的国家是一些“城市国家”。顾名思义，它们当然是以城市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各自独立的国家。每个国家都包括那个城市附近的农业区。雅典和斯巴达是它们中的两个著名国家。就对希腊文化和后来的西欧文化的影响来说，雅典这个小小的城市国家的贡献是巨大的。后来讲希腊科学、哲学、艺术、建筑等各方面历史的人，都不能不讲雅典。

我们讲西欧政治思想史也要从雅典开始。政治思想史是讲国家制度、活动及其理论的历史，要讲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政治思想史，就必须先对于作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的雅典国家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形势及其政治制度，有所了解。

雅典国家是在公元前六世纪末期，雅典原始公社解体的废墟上产生的，它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或内部的暴力干涉。在雅典的政治历史演变中，民主、寡头、僭主的统治常常更替着，但是高度发展的国家形态，即奴隶民主制度，却是直接从氏族社会中产生出来的。雅典在产生国家以前，梭伦的改革（公元

前594年)和克利斯提尼的革命(公元前509年)对于以后雅典的社会阶级和政治制度的影响很大。这里要提的是:梭伦的“革命”把那些拥有财产者的财产给予法律的规定,从而使他们的私产合法化了。这样确定了私有制一经有了法律的规定和保障,便加速发展着,从而阶级的矛盾也就日益明显。旧的血缘亲属团体的纽带便松弛了: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所描绘的,“氏族制度遭到了新的失败。”到了克利斯提尼的时候,氏族贵族的特权才最终被推翻,氏族制度的最后残余也就随之而灭亡了。克利斯提尼废除了以氏族和胞族为基础的旧部落,而代之以按居住地区来划分公民。他把希腊所在地的整个阿提卡半岛划成一百个自治区,即所谓“德莫”,由居民自选区长、司库和审理案件的法官。德莫的最高权力属于德莫特大会。十个德莫组成一个部落,这个部落是“地区部落”,而不是旧的“血族部落”了。它是政治组织,也是军事组织。每个部落还选出五十名代表参加雅典议事会。雅典国家也就这样形成了。这个国家是由十个地区部落选出的五百个代表组成的议事会来管理的,最后的管理权属于公民大会。凡属雅典公民都可以参加大会并有投票权。此外,还有执政官和其他官员掌管行政和司法事务。

我们讲以雅典为代表的古希腊政治思想史,主要是讲公元前五世纪下半期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中,伯里克利曾经执政多年,形成了希腊文化空前发展的时期。雅典从公元前五百年以来的政治制度和社会阶级情况,大致如下。

就国家组织说,雅典基本上是沿袭着克利斯提尼所奠定的基础。当时雅典国家的重要组织有:一,公民大会,二,五百人的议事会,三,执政官和将军,四,法庭。公民大会是全城

市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最早时期每月开会一次，自公元前四世纪起，每月开会四次。议事时采取举手表决的方法，必要时秘密表决。由于许多人从事生产（如农民），不能到会，有六千人就可以开会。五百人的会议等于公民大会的一个常设的执行委员会，一切实际工作都集中在这个会议。执政官主持法院（有时主持公民大会）并执行宗教祭祀方面的许多职务。将军管军事。法院不仅处理司法案件，还可以立法，也有很大的行政权。陪审员共有六千人，每年一选，凡满三十岁的雅典公民，都可以当选。法庭为一大集体，常有五百零一人之多。先用投票办法表决犯罪与否问题，然后决定处罚。一审终了，不能上诉。不能上诉的理由是，雅典人认为：法院是代表全民的机关，在全民之外没有可以上诉之处。五百人的会议由最初的选举方法产生改成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执政官从几乎完全由大贵族包办到一切富有的自由民阶级都可以担任。法院陪审员的资格只要求年满三十岁的公民，所以当选的人较为普遍。雅典国家机器的结构，就是这样。

政治主要是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在氏族社会趋于解体、梭伦按土地和财产资格用法律规定的阶级区分，到了这个时候，矛盾日益加深，斗争也日趋激烈了。雅典一般不从本国人中吸收奴隶，而主要是输入奴隶。自从梭伦禁止债务奴隶以后，雅典很快就发展了下列取得奴隶的方法：以战俘为奴隶、在海上掠夺奴隶、或从奴隶市场上购买奴隶。奴隶是雅典国家生产劳动的主要力量。而这些用自己的劳动力来支持雅典整个社会存在的奴隶，却是奴隶主们的剥削对象。他们不被看成“人”，他们在政治和法律上没有丝毫地位，他们是“会说话的工具”，他们是奴隶主的“财产”。二万一千个雅典公民构

成了奴隶主阶级，他们之所以成为公民，就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是雅典人。他们并不从事任何生产，而是靠残酷地剥削大约四十万个奴隶的劳动来维持生活。然而，他们却享有一切政治权利，并有充分的闲暇来从事一切文化活动，如科学、艺术、文娱、体育和其他公共生活等。当然，在公民阶级中，也有因为财产的多少和有无而形成的不同等级（或阶层）：其中有的是奴隶主贵族和富有奴隶主，有的是中等阶层，更多的是贫困的自由民。除此之外，还有大约一万多个从外国来的居民即“异邦人”，这种人不能参加公民团体、政治生活，而且在经济上、婚姻上受到许多限制。可是他们的地位比奴隶要好一些，因为只有当奴隶被释放以后才和“异邦人”的地位相等。

奴隶和奴隶主是希腊社会中的两个对抗性矛盾的阶级。他们的矛盾构成了奴隶制希腊社会的基本矛盾，也就是推动希腊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最初，奴隶对奴隶主的斗争并不是通过夺取国家政权的方式进行的，而是表现于奴隶对奴隶主政权的消极反抗。例如破坏奴隶主的工具，抢夺他们的财产，单独或集体逃亡等。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在斯巴达就有赫罗泰的集体逃亡。到了后来奴隶使用直接起义的积极方式来对付奴隶主了，如斯巴达就有过多次奴隶起义。无论采取消极的或积极的方式，奴隶的反抗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震撼了奴隶主的政权。值得注意的是，奴隶起义还常常得到自由贫民的支持和参加。这就不能不讲一下奴隶主阶级内部不同阶层或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了。

在雅典，奴隶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表现为经久不息的党派斗争，例如马其顿派和反马其顿派、亲斯巴达派和反斯巴达派、民主势力和寡头势力——也就是富人和贫民之间的斗

争，这种斗争是很尖锐的。连当时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如柏拉图都认为自由贫民们有“急欲叛乱”的倾向；又由于国内的党派斗争常常引敌国为外援，而使“雅典政局动荡不安，”“国家已不统一”。除了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社会基本矛盾之外，这种贫民和富有奴隶主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后来促使雅典国家没落的重要因素之一。有时贫民和奴隶还团结起来，并肩作战，共同对付富有奴隶主。作为剥削者的富有奴隶主们对于这些反抗和起义的回答是：用国家这一阶级压迫的武器来镇压。从雅典国家产生那天起，从来没有停止过奴隶和奴隶主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也没有摆脱过统治阶级内部的贵族势力、寡头势力和民主势力之间的党派斗争。党派斗争乃是为了通过攫取权力来确定统治国家的方式，他们的斗争情况和彼此的论点在希腊政治思想里面是有明显的反映的。

关于希腊文化的发展，有的资产阶级历史家认为：希腊的文化，包括哲学、科学知识、文学创作、雕刻、工艺作品以及伦理、政治思想等等之所以产生在伯里克利时代并获得空前的发展，达到一般誉之为“光辉灿烂”的程度，乃是由于当时的政治使然。也就是说：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文化的高度发展是由当时的政治决定的。我认为这种政治史观乃是一个“倒果为因”的错误看法。政治是社会的上层建筑，在某种意义上讲，它对人们的许多活动，不管是艺术还是科学，是可以起到提倡或阻碍作用的。甚至它对于当时社会的经济基础，也起着一定程度的反作用。在雅典历史上，梭伦、克利斯提尼也确曾用过政治力量推动了当时雅典奴隶制社会的发展。但是，这种政治力量的作用也只限于“推动”，其社会发展和文化繁荣的根本原因尚不在此。

事实上，伯里克利执政时期，雅典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获得巨大发展，也恰恰是奴隶占有制的社会阶级矛盾很剧烈的时期。当时，优秀的雕塑师和艺术家们精心地美化着雅典；知名的学者和科学家们都纷纷在雅典讲学并创办学校；雅典拥有希腊最好的剧场；富有阶层的公民们兴致勃勃地参加政治活动或公共娱乐生活；他们还自聘教师学习演说、修辞和有关学问以便在政治生活里取得显要的地位。这些人为什么有这样的闲情逸致呢？简单地说，因为他们都是奴隶主，都拥有从几个到上百的奴隶替他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奢侈、娱乐品，他们丝毫不必顾虑维持生活的问题，不必为自己的生活付出时间和劳动。

那末，当时的奴隶又是处于什么状态呢？奴隶处于被残酷剥削的地位，过着畜牲般的悲惨生活。各种各样使用奴隶劳动的工场相继建立起来，生产力显著提高，物质丰富起来。但工场中的劳动条件很坏，而且奴隶一有过失，就会遭到严酷的体罚。奴隶们不堪繁重的劳动和虐待，有的被迫逃亡，但即使逃出去了，由于他们都戴有上面刻着“捉住我，送还我的主人”的金属项圈，照例是要被人送还原主人从而会遭受更重的体罚。奴隶主的法律对他们是十分严酷的。在伯里克利时代（公元前450—430年）稍后的雅典就有过两万多个奴隶的大逃亡（公元前413年）。这就足以说明：当时奴隶和奴隶主两个阶级的矛盾和斗争是多么激烈。

由上可见，作为希腊城市国家典型的雅典之所以在文化、科学方面取得辉煌的成就，正是由于两万个奴隶主们占有着四十万奴隶，他们肆无忌惮地剥削着奴隶的劳动，由这种大量的无偿劳动给奴隶主阶级提供了充足的生活资料。正是由于奴隶

主们有这样一个取得其生活资料的方法，他们才有充份的余暇，有那样的闲情逸致来从事各种活动。而当时的政治正是这种生产关系的结果，绝不是它的原因。马克思对于那种认为古代雅典的一切是受“政治”支配的看法，曾经驳斥道：“……很明显，……古代世界……不能用政治来维持生活。反之，古代社会赖以取得它的生活资料的方法倒是可以说明：为什么在古代社会中政治……起了重要的作用。”^①换句话说，用奴隶劳动进行生产，才是雅典社会存在的物质基础。这个基础决定着雅典社会的一切政治、道德、哲学、宗教、艺术等等的性质和发展，而不是任何后者决定那个物质基础。政治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它本身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对于哲学、道德、文学、艺术等其他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它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推动或阻碍，却不能起最后的决定作用。古希腊奴隶社会的实践，恰恰证明了这一条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

^①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66页。（译文略有改动）